

虽九死其犹未悔

——记著名农业史专家胡道静

□ 吕雪莹

著名农业史专家胡道静,在治学道路上整整走过60多个年头。这半个多世纪的治学道路,是在巨大波动、动荡不安的艰难命运中度过的。他常用屈原《离骚》中的诗句激励自己:“亦余心之所美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家学渊源,勤奋攻读

胡道静家学渊源。父亲胡怀琛(寄尘)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多年,精通国学,著作甚多。伯父胡朴安,是海内闻名的国学大师,精于小学,著述丰富。由于书香之家的熏陶,15岁时他即以扎实的国学基础,插班考入持志大学文科国学系。17岁时,师从于版本学家陈乃乾,学习版本学、目录学和索引学,以及整理和影印古籍的各种知识;同时又参加了伯父胡朴安组织的学术团体——中国学会。

胡道静17岁时脱颖而出,写成《公孙龙子考》,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先后收集了清人陈澧、辛从益注本,俞樾的《诸子平议》和孙诒让《礼记》中的校语,又参阅了王献唐的《公孙龙子悬解》,对校过录之后,写成了《公孙龙子考》。18岁那年,胡道静写了《校雠学》,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载誉“通志”,办好《通报》

1932年,著名爱国人士柳亚子上海通志馆馆长,胡道静19岁被邀参加工作。通志馆于“八·一三”上海抗战时停办,计划中的《上海市通志》虽未修成,但出版了3本《上海市年鉴》,4本《上海市通志馆期刊》,两本《上海研究资料》。在日寇铁蹄践踏下,胡道静还替市通志馆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把一部分藏书,运到了比较安全的地方。在研究撰写通志史料的同时,他还写了《上海图书馆史》《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等著作。

在抗日战争严峻的岁月里,胡道静和已经解散了的上海市通志馆编辑部的绝大部分工作人员,在租界办了一份对敌斗争的报纸——《通报》。

胡道静倾爱国热情于笔端,写了许多鼓舞抗战斗志的文章,他在“孤岛”上海的抗日新闻界有了一定的声望。后来他担任《正言报》的总编辑(此报是吴绍澍用国民党三青团名义办的),《中美日报》和《大晚报》先

后请他当记者和编辑,他还为美国反日刊物《密勒氏评论报》撰稿。因此,汪伪特务机关把胡道静列入黑名单,伺机暗杀。

1941年夏的一天,胡道静离开办公室去接电话,窗外投进一颗炸弹,把他的办公桌炸得粉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入租界,胡道静在敌人的通缉下,只得离开上海,去金华《东南日报》任编辑。

钻研农史,造诣精深

胡道静对农业史更有深邃的研究。18岁那年,他父亲参加《万有文库》的编辑工作,看到儿子对古代科学比古典文学的兴趣更大,就把《万有文库》选题中有关《齐民要术》和《农政全书》的稿件交给他处理。他因此开始更加钻研中国古代传统的农业技术情况及文献。

1956年春,胡道静撰写和校注的《梦溪笔谈校证》出版,顾颉刚誉之为“有似裴松之注《三国志》。”有关人士评述建国十年中古籍整理的成就时,特别提到了顾颉刚主持标点的《资治通鉴》和胡道静校注的《梦溪笔谈校证》。在海外的胡适读了《梦溪笔谈校证》,曾对人说:“此书作者造诣甚深,真了不起!”1959年,胡道静又出版了《新校证梦溪笔谈》。

1981年3月20日,院部设在巴黎的国际科学史研究院,经世界著名科学史专家英国李约瑟、美国的席文和日本的宫下三郎三位博士联合提名,一致推选他为通讯院士,胡道静成为该院建院60年来所接纳的第一位中国学者。

为了使《梦溪笔谈》这个科学史“座体”更完整可靠,胡道静不断作新的补充。至1966年春,已写了40多万字的《梦溪笔谈补证》稿。

我国为庆祝《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博士80寿辰,由胡道静担任责任编辑,出版了《中国科技史探索》(国际版)。这部辉煌的巨著,刚传到英国剑桥大学,便深得学者好评。李约瑟高兴地说:“这是中国给予西方人士最大的荣誉,只有《明史》为利玛窦立传一事可以比拟。”

解放后,胡道静一直背有“历史包袱”,十年浩劫中又被关进“牛棚”,备受批斗。

1975年,李约瑟博士来华访问,指名要

会见胡道静。“革委会”接待人员拒绝了李约瑟的请求,李约瑟只得悻悻返国。

将吾所知,传诸后人

胡道静秉承父辈“手抄一遍,胜读十遍”的治学方法,口诵手抄六十春秋,撰写古籍、科学史方面学术论文近百篇,专著十余部。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为了能重新致力学术感到高兴。他的笔头更勤,先后撰写了《〈梦溪笔谈〉钩沉》等;辑录了徐光启两种农学佚著——《甘薯疏》和《农遗杂疏》,已印入《徐光启著译集》中;还出版了《农书和农史论集》《沈括研究论集》。

1982年,《历史研究》第四期刊登了他的《谈古籍的普查和情报》,受到国内古籍专家的重视,也引起国外学者注意。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文献中心委员长池田沼,把此文转译后发表于1983年3月号的《东洋文献通讯》。

胡道静担任中国科技史学会名誉理事、上海科技史学会理事长、中科院编委《中国农业科技史》一书的顾问、《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编委、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又是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兼职教授。他还忙于编审出版《章太炎全集》《柳亚子全集》。

尽管事务繁忙,但他仍然接受农业古籍整理出版小组及农业出版社的委托,担任整理《浦御农咨》(有关水稻栽培学的古农书)、《分门琐碎录·农艺卷》(久已失传的南宋早期的重要古农书)和《树艺篇》(早于《农政全书》而未被徐光启见到的、编成于明代中期的有关作物学与植物学的百科全书)的任务。

胡道静晚年患有严重的疾病,有一次曾痛得昏迷过去,不省人事,家人立即把他送进医院抢救,方才转危为安。出院后,组织已替他安排好疗养院,但他仍坚持担任了《中国科技史探索》的责任编辑。这是一本论文集,邀请了11个国家31位著名学者撰写论文。在文集编纂过程中,胡道静因劳致疾,咯血不止,对友人称:“我是一名战士,我能坚持下去。”

2003年,胡道静辞别人世。生前,他常对人说:“肝痛虽然常常发作,但我一息尚存,当将我之所知,传诸后人。”

民国时期,各地创办的报纸很多,仅仅从1917年到1921年,全国新出的报刊就有1000种以上,也就是说,年均新增报纸200种。这样多的报纸,要想生存,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于是,当时的各家报纸想尽了各种办法来赚钱,以求得有更好的发展。

民国时期的报纸上刊登的广告最多的是香烟、剧场、戏院、商场等广告,做这些广告的商家都是报纸的广告大户,也是当时报纸赚钱的主要对象,所以,当时的报纸总是会用很大的篇幅来为这些商家做广告。在民国时期的《中央日报》上,就常常出现半个版、一个版的香烟广告,因为当时照相技术还不发达,那时报纸上的广告都是手工画的图画,报纸上的很多广告画面都是用手绘的妙龄女郎来代言。

民国时期报纸的广告版面所占比例是很大的,比如当时的《中央日报》,虽然只有三张共12版,但是,每一张报纸里起码有两面是整版的广告,剩下的一半才是报纸的真正内容。

民国时期的报纸广告,还刊登有一些时令性的广告和一些启事,比如,每年的五六月份,夏天到来的时候,报纸上就会刊登各种汽水、清凉油等广告,这些广告和启事也是当时报纸的一项收入。

为了推销自己的报纸,民国时期的报纸也总是大打价格战,比如,当时南京的第一家民间报纸《民生报》就比其他报纸的价格要便宜。当时,很多报纸除了标明零售价格外,还把各种邮寄和打折的条件也写得清清楚楚了。比如1946年的《首都晚报》上,就打着“每份售国币一百元,每月三千元,平寄每月加收六十元,航空寄加收三百六十元,直接订阅纪念定户八折优待”的字样。可见当时的报纸不仅有订户价格上的优惠,还能空运到外地。从中更可以看出,民国晚期的物价已经上涨得很厉害了,一份报纸的价格已经上百元,而民国早期的《中央



民国时期的报纸

□ 王吴军

日报》才三分钱一份。

为了扩大报纸的影响力,民国时期的报纸除了在价格和服务上下功夫,当时的报纸宣传还用到了各种的“托儿”,《民生报》的创办人就曾经亲自去当自己报纸的“托儿”,他曾经跑到人多的报摊前买自己的《民生报》,一边买还一边假装认真地看,边看还边赞扬自己的《民生报》说:“这份报纸很好看,真的很不错。”

为了让自己的报纸卖得更好,民国时期的报纸也常常用吸引眼球的标题来吸引更多的读者。民国时期的报纸版面不多,比如当时的大报《中央日报》,总共3大张共12版,每张又分四面,但是里面的内容却非常全面,第一张首先是封面,封面主要刊登一些广告和启事,第二面刊登的是当下发生的国家大事,第三面刊登的是各地的时事消息,第四面刊登的是国内和国外的一些政务活动等消息。《中央日报》的第二张是“各地消息”版面,刊登有很多都市新闻,涉及到社会、民生、教育等问题,特别是教育新闻更是资讯详尽,比如哪里的大学院校招生了等内容。

相较于民办报纸来说,《中央日报》的标题比较正规,远不如民办报纸的标题吸引人的眼球。

见证红色老区革命历史的红军大印

□ 李连清



洪湖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洪湖瞿家湾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三大苏区之一湘鄂西苏区的红色首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人在这里放手发动群众,组建革命武装,战斗在河湖港汊,留下了众多英勇的革命事迹和弥足珍贵的革命文物。在洪湖市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展柜里,就陈列着一方极其珍贵的红军大印,它见证了洪湖老区早期人民武装由游击队向红军正规部队发展壮大的一段历史。

这方大印(附图)为木质,方形,印面阳刻篆文“中国红军独立第一师部印”12字,字体端整,书风雅逸,笔画线条均匀,遒劲有力。因年代久远印框和印文有一些破损,有的笔画有朽烂脱落。这方木质大印于1975年农民在耕整水田时发现。这方印章为楠木雕刻制成,印边较宽,在泥水中埋藏了近半个世纪而没有腐烂,而且印章完整,印文清晰,可能与楠木的质地坚硬、不易开裂有关。此后,这方红军木印被洪湖市革命历史博物馆珍藏至今。这方印章是目前洪湖地区收藏的唯一一方红军大印,亦是洪湖地区第一支正规工农红军部队使用过的印章。

“中国红军独立第一师”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洪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番号。1929年3月下旬,中共鄂西特委将监河游击队和江石游击队合编为鄂西游击大队,下辖两个中队,分别在江陵和洪湖活动,其中第二中队为洪湖游击队改编而成,段德昌任中队长。同年12月中旬,鄂西特委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将以洪湖为活动中心的监利、沔阳(今仙桃市)游击队和以白露湖为活动中心的江陵、石首游击队合并,组建鄂西(洪湖)游击总队,旋即又升编为中国红军独立第一师。12月20日,中国红军独立第一师在洪湖峰口正式

成立,师长段德昌,中共鄂西特委书记周逸群兼任党代表。中国红军独立第一师下辖3个纵队,共有官兵5000余人,枪1000余枝。在周逸群、段德昌等红军将领的指挥下,中国红军独立第一师利用洪湖天然的河湖港汊、芦苇蒿排等地理条件,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使队伍得到发展壮大,在战斗中锤炼成一支有组织、有纪律、具有战斗力的主力部队。此时,洪湖地区的革命斗争如火如荼,中共中央先后派许光达、柳克明、孙德清、卞继勋等人来到洪湖,加强湘鄂西红军的领导力量。中国红军独立第一师是洪湖(鄂西)地区土地革命时期创建的第一支正规红军部队,也是后来威震湘鄂西苏区内外



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的前身。大印面的红军部队印章,目前在其他地方尚没有发现,殊为珍贵,被鉴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从鄂西游击总队改编为中国红军独立第一师,再到升编为红六军的这段时间看,这方印章应该是在1929年底到1930年初刻制而成,虽然它的使用时间只有短短数月,但它所浓缩的却是中国工农红军由弱小而迅速发展壮大的一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过程。

陇上名医柯与参

□ 石颢

柯与参,又名柯敏(1903—1978),宁县九岷乡岳木川人,著名中医、中医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

1927年,柯与参开始行医。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专研中医,从《灵枢》《素问》到民间单方、验方都精钻细研。同时,他还先后赴南京、苏州、上海、北京等地,求教于章太炎、恽铁樵、陆渊雷、施今墨等医坛名家,奠定了他较厚实的中医功底,同时医术大有长进,求医者日增。

1931年3月,柯与参在平凉任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十三师军医。1932年3月,他任甘肃图书馆主任。1933年他被推选为甘肃省国医馆馆长和中央医馆理事。在此期间,他创办了甘肃省第一个中医学刊物《国医日报》,定期举办学术讲座,推进和发展中医教育。柯与参主张

医术不存在门户之见,善与西医合作,融各家学说于一炉。他既能通明中医经典,又能深识李东垣的健脾、朱丹溪的养阴、张子和的“三法”以及王清任的活血化瘀的理论真谛,形成辨证施治、临症自如的丰富经验。他尤对诊疗中医妇科、儿科及消化系统疾病见长。著名儿科良药“健儿素”,就出自他的处方。

柯与参也是一个博学多才的学者和爱国人士。他精通古典律诗和书法,写得一手苍劲有力的欧体楷书。家藏文史、医书和历代碑帖1万余册。1945年,柯与参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并多次以名医身份掩护共产党员的地下活动,抨击国民党,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监视与迫害。

新中国成立以后,柯与参积极参加

社会主义建设,得到了党和人民的信任。1956年和1960年,他两次带领医疗队深入甘肃陇南、陇东的克山病病区,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从中医理论上提出了“克山病属于痧胀范畴”的学术见解,与西医合作制定了切实可行的防治方案,发表了《克山病治疗经验点滴》一文,受到国内医学界的重视。

柯与参终生从医,为发展甘肃中医、培养中医人才作出了卓越贡献。为了纪念他的不朽业绩,甘肃新医学研究所将他多年的论文、医案、遗稿,搜集整理成册,出版了《柯与参医案经验荟萃》一书。国家卫生部原部长崔月犁主编的《中国当代医学家荟萃》一书,介绍了他的生平,并给予“中医专家,中医教育家”的评价。

元代的钞法与伪钞

□ 王淼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唐代的“飞钱”、宋代的“交子”“会子”都可说是纸币的前身,但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仍不能算是纸币;因为飞钱是一种汇票,而交子与会子的流通范围有限。真正使用纸币作为全国性通货,始于元代,也是世界最早的纸币,并流传影响周围的国家。元代发行过的纸币共有5种,以“中统元宝交钞”(简称中统钞)为主,终元之世,始终通用,官方的支付与计算均以中统钞为准。

元代实行纯粹的纸币制,禁止金银与铜钱的流通,对纸币的发行、流通、兑换等环节,以“钞法”进行管制与规范。《元典章》记载了元代钞法的缜密周详,例如“挑钞”是指挖补纸币的钞值贯文,改小为大,如一贯挑改作二贯;“昏钞”则是纸币流通已久而昏烂不能使用,应由官方收回烧毁,如《倒换昏钞条例》对各种情况的破损昏钞,甚至油污钞、鼠咬钞皆有规范。“伪钞”最为扰乱经济秩序,因此元代钞法规定,印造伪钞者处死,买使伪钞者与知而不首者皆处以连坐的处罚,另一方面,告获印造伪钞者给与赏银的奖励。

《元典章·伪钞》“伪钞不堪行使流

远”条曾记载的一个伪钞案。至元七年(1270年),司都喜与苏瘦儿等人因为印造伪钞而被捕获罪,“起意底、雕板底、印钞底、抄纸底、项科号底、家里安藏着印底、收买颜色物料底,俱事同情伪造”,罪证为伪钞950贯,主谋司都喜被求处死刑。但本案的争议之处在于“印造伪钞未曾使用红印、墨条印”,于是该案移送中书省再议,中书省认为“伪造未成”,因为“不似真钞,难以行使”,依“伪造宝钞首谋起意之人……处死”,显得过重,依“买使伪钞者,初犯杖一百七”,显得过轻;最后,将司都喜比照“印造伪钞已成中使的人,减死一等”,被判处流刑。

到了至元十五年(1278年),对于伪钞问题的执法趋于严厉,“今后印造伪钞之人……俱是同情伪造,皆合处死。”对此,一个值得考察的背景因素是纸币贬值。中国经济史学者全汉升在《元代的纸币》中指出:元代纸币流通的历史可以分为3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中统钞最初发行的20年,约为中统元年到至元十七年(1260—1280)左右,此时币值昂贵,流通情况良好。第二个时期较长,约为至元十八年到至正十年(1281—1350),中间

经历至元钞与至大银钞的发行,共约70年,因为时间较长,纸币价值下跌的速度不算快。第三个时期约为至正十年到元代灭亡(1350—1368),约18年,此时纸币数量大增,价值一落千丈,可称为“恶性通货膨胀时期”。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公布的《至元钞法》,规定“至元宝钞一贯当中统宝钞五贯”,等于官方正式承认:到了发行至元钞时,中统钞已贬值为五分之一,物价上涨五倍。

纸币贬值的原因甚多,除了伪钞,还有一种非官方发行的纸币,即“赐钞印”,但前者是非法的,而后者是合法的,两者都会增加纸币流通量。此外,因为民间缺乏小钞,应运而生的是“以物易物及私立茶帖、面帖、竹牌、酒牌,转相行使”。

因为纸币贬值日渐严重,使得伪钞问题受到官方注意。如《元典章·伪钞》的“禁治伪钞”条指出,大德元年(1297—1300),“印造伪钞八十八起,二百七十四人”,未破案的伪钞数量自然比已破案者更多。纸币贬值使得官方更加留意伪钞问题,至元十五年对于伪钞的执法明显变得严厉,便是一例。